



跨越时空的守望

孙杰 王建硕

时,卞康全正在弯腰清扫墓前的小路。他直起身,把扫帚靠在一旁,拍了拍手上的土,对我们说:“每年清明前都要添土,这是我们这儿的老规矩。旧坟春分之后添土,新坟清明当天添土。”他顿了顿,又补了一句:“这些烈士墓,在我们心里,从来都不是旧坟。”

五条岭位于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凤镇,说是岭,其实是5道长条形的土堆。1947年12月,盐南阻击战在这里打了4天4夜,2000多名解放军官兵牺牲。战事紧急,来不及一一建坟,当地百姓自发在平地上挖了5条沟,把烈士的遗体安放进去,覆土为坟。卞康全的祖父卞德容,就是当年参与收殓的人之一。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,烈士墓局部坍塌,卞德容拿着工具去修。之后他便时常去看看,哪里塌了就修哪里。卞德容去世后,卞康全的父亲卞华接着守;再后来,16岁的卞康全也加入了进来。这一守,就是三代人,近80年。

我们的镜头跟着卞康全走到一处墓前。他停下脚步,伸手摸了摸墓碑。他说:“我母亲说过,要把烈士的墓守好了,等他们的亲人来找。如果墓都没有了,人家来找的根都没有了。”他的声音不高,但在空旷的陵园里听得很清楚。画面缓缓推进,五道长岭上修剪整齐的草梗随风轻轻舞动。卞康全站在旁边很长时间没动,像守着一位老朋友。

1991年早春,一个外地女子来五条岭祭拜,说她的父亲牺牲在这里,她住得远,问卞康全能不能每年清明帮她添几锹土。卞康全答应了,却没想到来要个地址。再后来,过来祭扫的烈士亲人年纪越来越大。卞康全回想着那些年的事,说他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,心想,不能再等了。

2018年夏天,卞康全开始写信。他根据史料上记录的烈士籍贯,一封封寄出去,希望能找到他们的后人。第一批信寄出去10多天,就有人打电话来。后来陆续有人带着信找到五条岭,一进入

园就哭。卞康全说,他原本想,100封信里有1个烈士后人能找来就不算白写,没想到能找来十分之一还多。每次接到电话,他眼眶都是湿润的。

这些年,卞康全先后寄出了1400多封信。五条岭烈士陵园里,有1189名烈士被确认了名字,其中573名找到了家人。

镜头记录下了卞康全整理信件时的样子。他把每一封信都仔细核对,装进信封,再工工整整写上地址。他拿起一封信看了看,又放下,说:“每一封寄出去,就是一个希望。”

阜宁县的姜达宏,在2020年4月7日收到了来自五条岭的信。信上说,他的岳父宋正华烈士安葬在那里。宋正华1946年参军时,女儿还没满周岁。1954年,家人得知他牺牲了,却不知道他埋在哪里。他的遗孀季玉珍,守着那张根据女儿长相画出的丈夫画像,等了几十年。姜达宏接到信的当晚就给卞康全回了电话,并和妻子连夜送老人到了盐城,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五条岭。季玉珍静静地坐在烈士墓前,轻轻抚摸着怀里丈夫的画像。季玉珍103岁去世前,她对女儿说:“满足了,找到你爸爸了。”

采访临近结束时,卞康全送我们到陵园门口。他说:“明年清明,我还会寄信。”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,把影子拉得很长。我们问他打算寄到什么时候,他说:“寄到每个烈士都找到家为止。”

看着画面中卞康全转身走向陵园的背影,我们决定将本期节目命名为《五条岭的守护传承》。守护的是烈士安息之地,传承的是三代人近80年的守望。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守望——守的是忠骨,望的是归宿。当无名烈士有了名字,历史就不再是冰冷的数字,而是一个个可以被记住、被呼唤的人。

(作者系《军迷行天下》节目主创人员)
上图:《军迷行天下》“五条岭的守护传承”海报。

一位藏族老红军的信仰之路

李文吉

到革命战士的蜕变历程。

电影开篇,少年天宝在寺庙中诵经修行。当红军来到他的家乡,这位年轻的僧人第一次看到与他过去认知完全不同的军队。在亲眼目睹红军战士严守纪律、尊重藏族群众、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实际行动后,他最终选择加入红军。影片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:当看到红军战士宁愿饿着肚子也不拿藏族群众一粒青稞时,天宝的眼神由疑惑逐渐变成了敬佩。

信仰的力量,成为他一生坚守的精神

支柱。在爬雪山、过草地的生死考验中,天宝没有退缩;在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时,他没有畏惧;在个人利益与革命需要发生冲突时,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令人动容的是,天宝在长征途中不仅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,还要面对语言不通、文化差异等困难。他没有一句抱怨,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,逐渐融入革命队伍。

《天宝》真实地展现了红军在长征中,与藏族群众逐步实现民族团结的感人故事。红军与藏族人民间的信任,是以真诚和行动一点点建立起来的。影片中,当红军战士帮助藏族群众收割青稞、治疗疾病,当藏族群众为红军提供向导、食物和庇护时,民族情谊在不断加强。天宝作为藏族红军的杰出代表,他的成长历程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生动写照。他既保持着藏族文化的传统,又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,在文化交融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。这种文化认同的转变,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中的伟大智慧。

革命胜利后,天宝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,始终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。从长征路上的艰难跋涉,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默默奉献,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,没有忘记革命的初心。

主创团队坚持真实性与艺术性相统一,绝大多数情节都采用实景拍摄,让观众能够真实感受雪山草地的壮美与险峻。从服化道的精心准备,到演员的细腻表演;从场景的历史还原,到台词的情真意切,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,让影片不仅具有历史价值,也具有艺术魅力。

以天宝的人生经历为镜,我们可以照见自己的不足,努力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新长征。这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,也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。

左图:电影《天宝》海报。

资料图片

记录伟大抗战精神的珍贵影像

邓海英

影视看台

纪录片《伟大的胜利——苏联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抗战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制作,其素材源自苏联著名新闻纪录片导演、摄影师罗曼·卡尔曼在1938年至1939年间拍摄的珍贵历史影像。纪录片通过国际友人的视角,向世界呈现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壮阔图景,展现了中国作为“东方主战场”的重要贡献。

卡尔曼作为苏联政府委派的战地记者,在一年时间里跨越中国11个省份,行程25000公里,拍摄了10000多米长的胶片。卡尔曼亲历了武汉保卫战、重庆大轰炸、第一次长沙会战等重大历史事件,用镜头记录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真实场景。这些影像不仅填补了抗战影像档案的空白,更因其客观中立的第三方视角,成为研究抗战历史的重要史料。纪录片中首次披露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画面。这些影像与当时各国媒体报道、侵华日军作战命令实物、日军战俘供述相互印证,成为关于日本战争罪行无可辩驳的历史铁证。

“遥望中原烽火急,狂流一柱在延安。”1939年5月,卡尔曼抵达延安,拍摄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生活和和工作场景。毛泽东亲自邀请卡尔

曼到家中做客,彻夜畅谈中国人民抗战前景,表达对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。卡尔曼还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庆典,拍摄下毛泽东检阅抗大队伍、发表重要讲话的历史性画面。在发回莫斯科的通讯报道里,卡尔曼这样描述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:生活俭朴至极,谈话时用词简明扼要,常常引用民间俗语;在抗大发表讲话时,他语调平稳,声音不高,热情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听众。他拍摄的照片《毛泽东在杨家岭和陕北农民亲切交谈》成为历史上的经典瞬间。美国学者马克·赛尔登在《革命中的中国》中指出,这类影像颠覆了西方对中共领导的刻板认知。在延安的所见所闻,让卡尔曼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充满深情和敬意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抗战的希望就在延安,胜利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”“这个党不仅有正确的政治纲领,坚定的组织路线,忠诚的党员队伍,而且是一个实践型的革命政党,一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抗战的伟大胜利”。这不仅是外国观察者的洞见,更是历史给出的终极答案。

透过卡尔曼的镜头,我们看到了抗战精神的伟大力量。这种力量体现在一支朝气蓬勃、活力四射的年轻队伍中。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抗大,在黄土高原上培养出10万名军政干部,成为抗日的先锋骨干。这种力量体现在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激昂乐章中。

卡尔曼的镜头记录了鲁艺师生以笔代刺刀、以诗为子弹,“为抗战发出怒吼,为大众谱出呼声”,吹响全民抗战的战斗号角。这种力量体现在冲锋陷阵、英勇杀敌的将士身上。卡尔曼冒着炮火,记录了在晋西南前线八路军伏击日军的场景。画面里,八路军官兵用土制地雷炸毁日军卡车后,端起枪全力冲锋、奋勇杀敌。这种力量体现在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中。卡尔曼的镜头中,既有陕甘宁边区干部群众自力更生纺线开荒的火热场景,也有重庆工厂的工人一丝不苟制造武器装备的画面。卡尔曼通过一个个朴素的镜头,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民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,视死如归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,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,百折不挠、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。这种精神信仰不仅支撑了14年抗战的胜利,也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侮、追求复兴的文化基因。人们从这些影像中读出的,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激励,唯有铭记信仰的力量,方能理解何以“每一孔窑洞都是锻造胜利的熔炉”。

《伟大的胜利——苏联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抗战》为观众打开了一扇回望烽火岁月的窗口。通过纪录片,我们再次看到了延安窑洞的油灯、晋西南战场的硝烟、中国军民的同仇敌忾……这些烽火光影,终将化作照亮未来的火炬。

电视剧《反人类暴行》——

深刻揭露731部队罪行

丁松虎 赵春辉

影视观察

电视剧《反人类暴行》,讲述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工作人员小金为寻找真相,开展跨国取证,逐渐还原那段岁月真相的故事。该剧通过对历史的还原与视觉化的表达,深刻揭露了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,将残酷的人体实验与泯灭人性的暴行公之于众,展现了中国人民从精神觉醒到奋起反抗的斗争历程,唤起了人们对战争、人性与正义的思考。

相较于过去呈现日本731部队罪行的影视作品,《反人类暴行》在叙事层面有所创新,采用的是“双时空双线”的叙事结构。剧中,一条线锚定在1992年前后,以小金为线索,开展跨国取证,逐渐还原那段岁月真相的故事。另一条线则聚焦1940年前后的哈尔滨,通过3个主要人物的视角,逐步揭开“关东军防疫给水部”细菌实验的恐怖面纱。两条故事线相互补充,深刻揭露了731部队的罪行。

该剧前三集分别以3个人的单一视角展开:第一集从底层送货员佟长富的视角,引出731部队进行动物实验的事实;第二集转到制菌师荒川良平的视角,从731部队内部记录者的角度,让观众得以窥见细菌实验的残酷;第三集则通过日本导演小岛幸夫的“眼睛”展开,以“满洲新娘”为线索,逐步揭露军国主义如何用摄影机粉饰太平。

前三集前后呼应,之后的篇章便跟随他们的视角,从外围到内部、从表象到本质,逐渐深入,曝光日本731部队的丑行,如镜子般映照出一段历史的立体全貌。

二

《反人类暴行》的影像风格与沉重主题紧密结合,以冷峻、克制为主基调,运用精密的镜头调度、风格化的镜头语言,构建具有冲击感的视觉效果。

《反人类暴行》的片头采用动感较强的动态地图引出整个故事发生的地点,为观众交代本剧的故事内容。每集最后,将俄方移交的伯力审判录音原声融入片尾,由战犯自己承认的细菌战诸多细节,有力佐证了731部队罪行的真实性。

超现实的镜头与梦境画面的频繁使用,增强了该剧的视觉冲击力与心理压迫感。比如佟长富被日本人击晕,接着镜头转入佟长富的梦境:他的马被巨大的铁钩钩住,他死抓不放,只得一起落入

冰窟窿中。冰水瞬间变成了血水,鲜红刺目。佟长富从梦中惊醒,抬头发现手上已经戴上了镣铐,如铁钩将他死死困住。梦境与现实的巧妙嫁接,既实现了平滑的转场,也展现了人物的真实心理活动和残酷现状。超现实手法在制菌师荒川良平的身上使用最多,如纸上突然出现象征罪恶与恐惧的黑色血浆,逐渐蔓延出病态的形状。他在满足器官解剖室里听到死者的呼喊等诸多展现个人心境的镜头,都将反人类暴行带来的不适感具象化,让观众从不同个体的内心挣扎与焦灼中,体会到日本731部队从精神、肉体上对人的残害。

此外,光影设计、音效安排、实物道具等一系列设计,营造出极具张力与想象空间的视听体验,让731部队的“恶”赤裸呈现。

三

《反人类暴行》中的人物塑造跳出简单的“英雄-恶魔”二元框架,呈现人性的复杂多维。

佟长富是沦陷区隐忍求生的一位普通货郎,经历种种变故,逐渐窥见关东军防疫给水部“高墙”里的恐怖真相。最终,他因轻信日本人而导致东北抗联战士牺牲,加速了他的觉醒。面对身边人的冒险与牺牲,他也毅然做出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选择。佟长富预料此行九死一生,但没想到未及行动,他便先遭毒害。通过佟长富从懦弱、觉醒到赴死的弧光,塑造了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成长型人物。

荒川良平是一个极具张力的悲剧性人物。他本名陈汝平,生于中国台

湾,自幼接受日本教育。作为制图师,他以“日本人”身份来保全自己。然而,在731部队内部,他亲笔描绘的各种细菌实验,彻底击碎了他对日本的美好幻想,让他现实与梦境中备受煎熬。他开始被“陈汝平”这一中国人的身份所唤醒,试图帮助被捕的中国人逃离。然而,母亲去世,日本继父让他留在满洲。失去精神支柱的陈汝平陷入绝望。最后,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,选择吃掉毒苹果,躺在死去的佟长富身边。在剧中,他朗诵关于地狱与恶魔的诗篇,用中文呐喊自己是魔鬼等情节,皆是主创借角色之口发出的愤怒控诉。

四

在《反人类暴行》交流会上,有人提到这样一个观点:“将大量镜头对准施暴者,而非受害者,更易引导观众审视罪恶产生的系统性根源。”

《反人类暴行》的历史价值,不仅仅是“还原一段历史”,而是让人思考更为本质的问题——铭记暴行,是为了警醒世人,不让历史重演。

全剧的结尾,不是缉拿归案的完结,而是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:“特别移送名单”经过近百年的传递,终于被小金发现。然而,当下的证据还不够全面,暴行的策划者仍“逍遥法外”,历史档案依旧残缺不全,日方仍以“国家无答复”为由拒绝判决。

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被掩埋的。这些未完待续的留白,恰恰是最有力的控诉和最紧迫的呼吁。

下图:电视剧《反人类暴行》海报。资料图片

